

文史哲研究丛刊



先秦文学制度研究

罗家湘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史哲研究丛刊



先秦文学制度研究

罗家湘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秦文学制度研究 / 罗家湘著.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3

(文史哲研究丛刊)

ISBN 978-7-5325-5793-6

I. ①先… II. ①罗…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06902号

郑州大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成果

责任编辑: 冯海荣

装帧设计: 严克勤

文史哲研究丛刊

先秦文学制度研究

罗家湘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 插页3 字数 224,000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978-7-5325-5793-6

I·2288 定价: 2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厂质量科联系

序

徐正英

罗家湘教授虽小我6岁,却先我一年问学于恩师赵逵夫先生门下,是我深为敬重的师兄,其道德文章一直是我追慕的榜样。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为师兄的论著写序都是没有资格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因长期从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一直对这一学科发展的出路问题有所思考,并且坚持认为,向文学制度领域延伸和拓展,是21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再获发展的主要途径。也正是基于我们二人的这一共同认识,罗师兄才申报了《先秦文学制度研究》这一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因此,对这部书稿我倒是有话要说。于是,当罗师兄将书稿交我让我写序时,也就自不量力地答应了。

—

依学术界的主流看法,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学科的建立,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此前一千多年的长期积累,被视为学科建立前的准备时期。同时,本学科的建立又是以1927年南京大学陈钟凡教授出版的讲义《中国文学批评史》为标志的,因为它是第一部以“文学批评史”命名的国人著作。说到这里,为便于阐述问题,不妨对本学科的名称略作解释。本学科有两个习

惯称呼,一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简称文批史)”,一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简称古代文论)”,实际上这两种称呼都不能完全涵盖本学科的内容。“理论”主要是讲文学的基本原理、理论原则,“批评”主要是讲对作家作品的具体评介。而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无疑既有古代的文学理论原则,又有古代的作家作品评介,因此称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比较科学,这一称呼现已为越来越多的专家所使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即是“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历史”或“历史上的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日本学者称我国的这一学科为“文学思想”,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纲》就与我国学者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内容相同。而近些年国内学者所著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范围则明显扩大且宽泛了,在“理论”与“批评”之外还包含了审美观念、创作倾向等内容,以“文学思想史”、“文艺思想史”甚至“美学思想史”代替“文学批评史”指称本学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自1919年“五四”运动算起,本学科已走过了90余年的风雨历程,目前发展到了全面总结性的集大成时期。这种总结性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通史性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从1927年陈钟凡先生7万余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版,到1997年王运熙先生主编近400万字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全部出齐,70年间就有近百部通史性、断代性、分体性的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包括文学思想史、美学思想史)著作先后问世。其中各个时期有影响的代表性成果就不下20种,依次有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 1934),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 1934),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1934),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略》(1939),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3),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 1947),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二 1948),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三 1962),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1962),刘大杰

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 1964),敏泽两卷本《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1981),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1982—1985),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1984),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1986),蔡仲翔、成复旺、黄保真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1987),敏泽三卷本《中国美学思想史》(1987—1991),张少康两卷本《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1995),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1995),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1996),蔡镇楚《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1999)等。王运熙、顾易生两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面世,标志着该学科总结性集大成时期的到来。该巨著对文学理论批评资料的竭泽而渔,对作家、作品、文体、文学思想、文学问题探讨的至精至微,都毋庸置疑地被学术界公认为“划时代的论著”(日本九州中国文学会编《中国文学论集》第二十四号柳川顺子文)、“集大成的巨著”(《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5期彭玉平、吴承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如果说七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未涉及审美观念和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倾向而覆盖面还不够广的话,罗宗强主编正在陆续分卷出版的八卷本《中国文学思想通史》则无疑是研究对象更为广泛的集成性成果;敏泽修订的大十六开两卷本近160万字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则是研究对象更为广泛的总结性成果。将这三套大型通史合而并观,称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学科的纵向“史性”研究已进入到了集大成时期,应该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方面的研究若想再有大的超越恐怕是很困难的。

其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资料的整理也进入集大成时期。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专著的整理,上世纪50年代郭绍虞就已开始主编,他之后整理出版一直在继续。这套“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出版了《文心雕龙注》、《诗品集释》、《沧浪诗话校释》、《文赋集释》等40余种,较为重要的专著多已整理校注面世。单篇文学理论批评资料的辑录,也从上世纪50年代

开始,除为人所熟知的郭绍虞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为基本资料读本外,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将“中国历代文论选”各代分卷——《先秦两汉文论选》(张少康)、《魏晋南北朝文论选》(郁沅、张高明)、《隋唐五代文论选》(周祖谟)、《宋金元文论选》(陶秋英)、《明代文论选》(蔡景康)、《清代文论选》(王镇远、邬国平)、《近代文论选》(舒芜等)全部出齐,这套资料名为“选”本,实则历代重要文学理论批评单篇资料大都辑入其中。断代文论全编则先后有郭丹主编《先秦两汉文论全编》、赵逵夫主编《先秦文论全编要论》、穆克宏、郭丹《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等。文学理论批评资料的分类整理,则更是从清代就已开始,至今已基本完成。其中诗话有《历代诗话》(清何文焕)、《历代诗话续编》(丁福保)、《宋诗话全编》(吴文治)、《明诗话全编》(吴文治)、《清诗话》(丁福保)、《清诗话续编》(郭绍虞)、《民国诗话丛编》(张寅彭)等;词话有《词话丛编》(唐圭璋)等,文论文话有《历代文话》(王水照)、《中国古代文论类编》(贾文昭)、《中国近代文论类编》(贾文昭)等;曲论曲话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蔡毅)、《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吴毓华)、《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隗芾、吴毓华)、《历代曲话汇编》(俞为民);小说论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黄霖)、《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黄霖)、《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粹》(孙逊)等;美学资料有《中国古典美学丛编》(胡经之)等。专题资料也已有人基本整理完毕,徐中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已陆续出版了《神思》、《文质》、《本原》、《教化》等10多编。综上所述,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资料的系统清理已基本完成。另外,对专书,尤其对理论批评名著如《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等的整理与研究,亦已颇为精微。

就“横向”体系研究而言,以1947年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为标志,奠定了研究基础,经过几十年断断续续的研究,20世

纪末亦产生了阶段性成果,即2000年复旦大学出版的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丛书《原人论》(黄霖等)、《范畴论》(汪涌豪)、《方法论》(刘明今),标志着这一研究正处于兴盛时期。

综上所述,本学科的纵向研究和资料整理已进入集大成时期,进一步的研究和整理已没有多少空间,只能是修修补补、个别填充,要想作整体超越已经没有太大可能。

二

那么,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出路在哪里呢?如何才能超越现状再创辉煌?笔者以为,无非是从新文献的发掘、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领域的拓展三个方面入手。

先说新文献的发掘问题。如前所述,就传世文献而言,集成式的文学理论批评史著作和资料汇编,已搜罗宏富,甚至竭泽而渔,很难再有大规模文学理论批评资料的发现。有学者曾提示从目录学著作中发现新的文学理论批评资料^①,确实很有启发意义,现有的文论资料搜集在这方面确有欠缺。不过搜集时需要注意的是,一则仅有目录而无叙录内容的目录学著作对此项工作没有帮助,需要排除;二则经、史、子、集目录中仅限于集部目录的叙录部分与文学理论批评有关系。据此,笔者以为较有价值的目录学著作当有宋《崇文总目》(辑释)、宋《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清《天禄琳琅书目》、清《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清钱曾《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清吴寿旻《拜经楼藏书题跋记》、清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清陆

^① 彭玉平、吴承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5期。

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等。由所列可见,目录学中的文学理论批评资料虽有一定规模,但也是很快就能开掘完的。吴承学似以一篇学术论文即已将规模最大的目录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中的相关理论批评资料基本廓清。

除传世文献中目录学著作之外,笔者以为最主要的还是寄希望于地下出土文献。2000年以来,上海博物馆陆续整理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孔子诗论》及相关文学理论批评文献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对孔子文艺思想研究和《诗经》研究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追踪的热点。我们期待着类似的文献能不断地重见天日。不过,地下文学理论批评文献的出土仅能局限于先秦两汉时期,至多延伸到六朝,不可能寄希望于更晚的墓葬。道理很简单,六朝以后竹简已被纸质载体所取代,藏书制度已趋完备,不可能将易湿损的大批纸质图书随葬地下。“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没有新的资料,研究上想有新的重大突破是困难的。

再说研究方法的创新问题。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是正常的,“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道理人所共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一直热炒不衰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话题大讨论,实质上就可归属到研究方法的创新上去。运用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新的视角审视固有文学理论批评资料,不失为学术出新的一种途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固有资料就那么多,之所以一代代学者常研常新,可能就是人们在用发展着的时代眼光不断重新审视的结果吧。但是,也正因为时代眼光和观念具有如此的动态性,其研究成果则往往时效性强,而恒久性弱,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话题的大讨论,之所以不大可能讨论出结果,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各以自己的所谓“新眼光”、“新观念”去审视评判固有材料,只能是各讲各理,各说各话,终究不属于研究领域的新开拓。

后说研究领域的拓展问题。笔者以为,21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若要实现新的跨越,应该把关注点放在研究领域的拓展上。往哪个方面延伸和拓展呢?彭玉平、吴承学的建议对我们启发很大^①。他们认为,一可向民间思想领域拓展,一可向统治阶级思想领域拓展。笔者以为,向民间思想领域拓展确实重要,但不太现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民间的思想作为一种群体意识确实很有代表性,但它多数情况下却并没有形成文字形态,其观念是百姓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日常生活的行为和言谈中表现出来的,他们不太可能也没想过要写出来,因而我们很难去整理研究它。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就是所谓某一阶层的“群体意识”。古代的老百姓对文学的群体认识是什么样子的呢?很少有文字记载,因而我们很少知道。所以,笔者认为,重要而又切实可行的研究是向统治阶级领域延伸和拓展。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向统治阶级的文学思想领域进行拓展,是21世纪前景最为广阔的一个研究领域。理由有二:

其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永远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一真理不容质疑,文学思想也不例外。文人学者对文学理论与批评乃至文学思想规律的探讨,首先是在统治者统治时代的思想背景下进行的,受时代背景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其探讨出的文学规律性的东西,只有为统治者所接受、吸取,变成统治阶级文学思想的一部分,它产生的影响才会大,否则,可能只是个体之间的影响,在古代封建专制体制下尤其如此。文人学者的学术思想,被统治者部分地汲取,根据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就会变成制约、规范或鼓励文艺发展的文艺政策。文艺政策的逐步成熟、固定,可能就进而形成符合统治者最高利益的规范文艺发展

^① 彭玉平、吴承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5期。

的文艺制度。文艺政策和文艺制度相对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思想无疑没有多高的理论价值,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对文学艺术发展走向的规定性作用要比文人的理论批评作用大得多。尤其在专制体制下,统治者倡导什么、反对什么,不论它符合不符合文学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都直接导引或驱使着文学艺术的发展方向,因为它行使的是公权力。因此,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学科研究领域向这个方面延伸和拓展,无疑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切实可行。只有了解统治阶级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政策,才能对各个时代的文学风尚、审美趣味、发展走向有比较深入和全面的认识。

其二,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属空白,大有发挥的空间。囿于笔者所见,虽然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彭玉平、吴承学两先生就已发现了开拓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但至今并未引起更多研究者的重视,除 20 世纪 80 年代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90 年代陈飞先生的《唐代试策考述》,对具体的科举制度与唐代文学发展的关系有所涉及外,学术界并没有正面研究中国的文学制度的成果面世。提醒不要误会的是,中华书局近期出版的饶龙隼《上古文学制度述考》一书,实际上并不是文学制度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制度无关,正如作者在该书导论中所界定的,“所谓文学制度,质言之,就是文学自身的规定性。它由文学自身生成,不为外力强加”。也就是说,该书讲的是文学内部自身发展规律,说白了还是文学基本原理。因此严格说来文学制度研究还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也正因此,罗家湘教授的这部从源头上做起的《先秦文学制度研究》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原创性成果,其意义之大就不言而喻了。

三

那么,文学制度都应该研究些什么内容呢? 笔者愚见,应包括

五个层面：一是各个时期统治阶级的文艺思想，二是在其思想指导下所制定的文艺政策，三是在文艺政策实践基础上沉淀出的较为固定的文艺制度，四是其文艺政策或制度对当时文学创作、文学发展的具体影响，五是其文艺政策或制度对当时文人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

那么具体到先秦文学制度的研究，又应与以后各代的研究有何不同呢？笔者愚见，先秦时期政策与制度不分，文史哲不分，文学与艺术不分，诗与乐不分，甚至文学艺术与文化不分，所以，研究先秦时期的文学制度，毋宁说是研究其文化制度。又由于当时的一切制度尤其文化制度都尚处于草创时期，规定、政策、规范、制度等混合一起，很难区分清楚，故对其研究时眼界要放得宽，很可能从后代眼光看算不上文学制度范畴的东西，均被涉及，这是时代特征决定的。

依据如上讨论，我们回头来看一下罗家湘教授这部《先秦文学制度研究》一书的价值和特点。罗家湘教授的这部论著，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郑州大学为扶持人文学科的发展，出台了打造“人文学科学术精品”计划，每年资助出版10部人文学科的学术精品。学术精品筛选标准极为严格，实行名牌大学专家双向匿名盲审制，宁缺勿滥，罗家湘教授的书稿首批入选，全校申报的数十部书稿只通过了6部，没有完成学校计划，罗家湘教授的书稿全票入选，可见其为名副其实的郑州大学学术精品，代表郑州大学的学术水平当之无愧。那么这部学术力作的价值和特点何在呢？我个人以为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选题原创，填补空白。如前所论，文学制度在我国还是空白，目前还无人正面涉及。称罗教授此课题在文学制度研究方面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并不为过。该论著以先秦文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为研究对象，正本清源，具有示范意义。制度是与人相联系的制度，人的活动规范化、程式化就上升为制度，制度又

为人的活动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空间。先秦文学制度包含先秦时代不同阶层人物的文学活动。第三章论述宗教性职官的敬神文学活动。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代,人们最初的精神活动就是宗教意识,这种宗教意识把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区分开来,而神的世界完全是精神活动的产物。人们充满激情地描绘、歌唱神的世界,追求与神同一。神话、歌谣等文学形态就在这种精神活动中产生了。第四章论述人文性职官的尊君文学活动。到了西周时期,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当自然力量被驯服以后,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人类社会本身。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使得中国文化发生了一种“人文的转向”,人文类职官关注人与人的关系,把礼仪道德看成是卫护重点。乐官和史官是人文类职官的代表,史官用散文记录,乐官用诗歌表达;史官关注君主与官吏阶层的互动,而乐官关注君主与民众的联系;史官记录已经发生的事情,乐官歌唱人们心中向往的事情。第五章论述诸子的宗师文学活动。战国时代,王官们失业了,从私学获得知识的士阶层崛起,士阶层不能用血统来保持自己的优势,只能把他们掌握的知识作为获取地位的条件。排斥血统与权力的结合,追求知识与权力结合,成为士阶层的任务。但是,用知识去驾驭权力是非常艰难的,知识的邪与正、权势的尊与卑、君臣遇合的喜与忧从此困扰了士人的心灵。士人们以宗师为中心结成学术集团,以集团力量寻求知识者的地位。西河集团在魏国得到完全信任,可以说是知识与权力结合的典范,但只留下一些行政文书;稷下集团在齐国得到最大的尊重,士人凭知识骄王,有士贵于君、民贵君轻之论;楚国的兰台文人渴望政治权力而不得,被君王倡优视之,却在文学创作方面获得丰收。

此书各章对如上情况的勾勒和描述,表面上看似似乎不是对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制度的揭示,实际上已经原创性地揭示了先秦各个时代的制度与宗教性职官、人文性职官、诸子宗师等人物文学活动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对当时文学走向的影响,不是为研究文学

制度本身而研究文学制度,而是将落脚点放在制度对文学活动的规范和影响上,这就抓住了根本,也正是本书的主要价值所在。

其二,体系完备,整体厚重。全书分为五章,依次为文学制度导论、文学制度的观念预存、宗教类职官与文学制度、人文类职官与文学制度、士人与文学制度。各章之间既层层递进,又全面论及,将其研究内容建构起了一个大体完备的体系。在导论部分确立了先秦文学制度体系。既从制度规则、制度理念、制度对象、制度载体四大构成要素分析,论证先秦时代已经具备了文学制度的各项要素。又从先秦文学的有效生产、传播、消费环节勾勒出先秦文学制度系统的运行情况。三章、四章、五章依次具体讨论了巫官文学制度、祝官文学制度、乐官文学制度、史官文学制度、教育制度与士人的言志活动、士人独立与文学创作的繁荣等。各种概念讨论得非常清晰,各种人物活动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得系统全面。需要指出的是,该书所有观点的提出和所有结论的获得,都是通过广征博引大量元典文献并深入辨析探讨出来的。全部书稿均靠实证说话,力戒虚浮空论,仅征引的先秦两汉元典和出土文献就达40余种,参用的中外研究成果则更多。正因如此,给人一种突出的厚重感、信实感和完备感。

其三,视野开阔,中西互参。该书给人的另一个明显感觉是能以博大的胸怀、融通的眼光审视先秦文学制度,善于广泛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和一切先进理念,其第二章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该章采用中西互参,民俗学、社会学互证的方法,从原始宗教角度描述先秦文学舞台的搭建与控制。认为图腾崇拜时代,由图腾分类到职官分类的发展,显示出中国文化空间观念的不断完善。而祖先崇拜时代,开创父系时代的神话英雄确立了文化的起点,中国文化的时间意识也具体化了。虽然文明的发展是以对事物的细分为前进方向的,但中国文化控制这个时空舞台的秘诀则在于建立联系。现代分类把自然与社会、外物与内心的区别看做是天经地义,

而中国古代的同感共鸣则以联结自然与社会、沟通外物与人心为最大的互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人合一、心物冥合的中国文化特色,也是古代中国人所构造的控制时空的方法。心物相通是一种更简便的控制世界的法门。中国古代文化重视通过控制自己的心灵状态来控制外部世界,斋戒是普遍采用的一种心灵控制技术,通过斋戒,人们改变了认识事物的方式,从而实现了把握事物的目的。

该章之所以能对先秦文学舞台的搭建与控制有以上如此深刻独到而颇富说服力的见解,是和著者多学科的知识素养分不开的。别的不说,仅该章吸收的西方相关知识就颇为令人佩服了,其所引用的西方成果涉及德国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海德格尔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英国帕林德的《非洲传统宗教》、诺曼·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变迁》、詹·乔·弗雷泽的《金枝》、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卡莱尔的《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法国葛兰言的《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乔治·维伽雷罗的《洗浴的历史》、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爱弥尔·涂尔干和马塞尔·莫斯合著的《原始分类》、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美国的马文·哈里斯的《文化人类学》、戴安娜·克兰的《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弗朗兹·博厄斯的《原始艺术》等17部学术著作,其视野的开阔、理念的前卫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这是一部具有开创之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实证性学术力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学科建设里程中将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2010年10月1日国庆节

谨识于郑州大学雕虫书屋

目 录

序	徐正英	1
第一章 先秦文学制度导论		1
第一节 先秦文学概说		3
一、先秦文学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		3
二、先秦文学活动多姿多彩		9
三、先秦文学文体发展完成了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		14
第二节 文学制度		20
一、制度内涵		21
二、文学制度要素		24
三、先秦文学制度系统		34
第三节 听政范式		40
一、从听于神到听于民		43
二、立言与慎言		48
三、以耳通神		54
第二章 先秦文学舞台的搭建与控制		59
第一节 图腾崇拜与空间意识		61
一、以物命官		61
二、五行与五正		63
三、职官五正		65

四、法度五正	75
第二节 祖先崇拜与时间意识	77
一、文化孤儿	78
二、父系传承	79
三、祖先祭祀	81
第三节 袷褻与比兴传统	83
一、袷褻的含义	83
二、农耕袷褻	86
三、生育袷褻	91
四、袷褻与比兴	100
第四节 斋戒与文学思维	104
一、斋戒——灵媒的炼造	105
二、集义与集虚	110
三、法天与养气	113
第三章 宗教类职官与文学制度	117
第一节 巫官文学制度	119
一、观象授时制度与月令类文献	120
二、卜筮制度与卜筮之辞	129
第二节 祝官文学制度	136
一、祝是一种富有文学色彩的活动	136
二、祝官的设立与职责规定	142
三、祝官文学活动规范	150
四、祝辞模式	158
第三节 大祝“会”辞源流考	169
第四章 人文类职官与文学制度	180
第一节 乐官文学制度	181
一、乐官的职掌	182